

空间、记忆与日常生活:谢尔盖·多甫拉托夫 小说《分支》中的移民身份认同

李振华

摘要:《分支》是当代俄罗斯域外作家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移民后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展示了俄罗斯侨民达尔马托夫处于美俄两种文化巨大差异之下的身份困境,讲述了他从遭遇身份危机到进行身份重构的历程。本文以时空的流动与交错为线索,分析主人公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移民后空间的变迁将主人公的身份困境直观化,而俄侨大会激起了他隐匿的身份焦虑;大会与列宁格勒的时空交错模糊了记忆与现实的边界,使得主人公转向过去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在选择回归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主人公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定位。他接受了现实的荒诞性却并不妥协,而是面向未来,继续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永恒的精神寄托,同时保持身份的多元性,建构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身份”。

关键词: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分支》;时空性;身份认同;记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25)04-0062-11

引言

作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三浪潮”的代表作家之一,谢尔盖·多甫拉托夫(Сергей Довлатов)移民时期的作品多描写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活状态,折射出移民群体边缘化的生存空间、国族身份的割裂感,以及文化认同上的冲击与困惑。他的创作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擅长以幽默、戏谑的笔触以及碎片化、解构式的手法揭示“生活的荒诞与生存的荒谬”(张建华,2003:18),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而且也吸引了国内外文学评论者的注意。作家兼文学研究者亚历山大·格尼斯(Александр Генис)(1995:466)便曾称多甫拉托夫的小说为“当今俄罗斯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典范之作”。

作者简介: 李振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俄罗斯女性文学。

小说《分支》(Филиал)的主人公达尔马托夫不仅名字与作家相像，而且经历也与作家十分相似。他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在一次参会期间偶遇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塔夏，她唤起了主人公在列宁格勒的记忆。最终俄侨大会荒诞结束，塔夏离开，而达尔马托夫独自返回纽约。

小说《分支》的时空艺术独具特色，空间维度上强调了苏联与美国不同文化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比，并且凸显了俄侨大会这一游离于美国之外的移民聚集空间的象征意义，时间维度上小说的非线性叙事引出了俄侨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正是通过这样的时空表现手法，作家多甫拉托夫展现了俄罗斯“第三浪潮”移民在美国的身份困境，以及他们的身份探寻与重构，而时空的流变、交错与融合贯穿移民主人公身份认同的整个动态过程。

空间变迁与离散共同体：从隐匿到显现的身份困境

作为新美国移民，主人公达尔马托夫的身份危机隐藏在他对苏联与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社会与文化空间的感知之中，一面是他度过青年时代的列宁格勒，历史悠久却古老破旧，但总能带给主人公家的感觉；另一面是移民后他当下以及未来居住和工作的纽约，典型的美国超级都市，多元开放却复杂混乱，摩登现代却缺少精神根基。作家并没有直接书写移民在新环境遭遇的困难与心理感受，而是通过对空间的描写来将其直观化，因为小说中不同空间所呈现的特性都是借由主人公达尔马托夫的眼睛观察得来的，融入了他本身的感知与体验，这使得小说中的空间具有了符号学性质与象征意义，成为表意的“文本”。

空间与身份认同问题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份认同关注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主体对“我是谁？”问题的思索与探求。身份认同问题的意识形态和人文属性决定，个体所经历的地理与文化空间对其身份认同及构建有着重要意义。个体与空间的交互是个体与社会产生联系的方式，个体在空间系统中的定位也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2003: 48)将空间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视空间为生产性的、政治性的存在，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因此，社会空间超越了自身的物质属性，具有了社会和文化意义，社会空间可以说是高度人化了的自然空间，人的主体意识也与之联结并体现在其中。生活在社会空间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空间及其中的景观，接受着空间给予的精神体验，并在生活中逐渐形成自己对空间的独特感知与认同。基于这种不同地方的人对自然与人力共同塑造的物质环境所产生的不同感受与价值观，段义孚(2018: 5)阐释了人对地点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将“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称为“恋地情结”，主体在某地

的居住、旅行等经历使得人地之间产生了情感联结，其根本是人对地方的深刻认同。作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认同也受到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及情感联结的影响。处于瞬间性的、流动性强的现代城市空间中，个体所面临的身份归属问题更加复杂，人们需要在社会关系过程中不断确定自己属于哪个或哪些社会群体。对于小说《分支》的主人公达尔马托夫来说，他对自我的认同与对空间的感知紧密联系，从祖国的列宁格勒到移民地纽约，再到模糊时空边界的洛杉矶俄侨大会会场，空间的变化促使他思考人与地、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祖国的过往也以记忆的形式不断提醒着他“我从哪儿来”，空间变迁既是他身份焦虑爆发的原因，也是他进行身份重构、重现自我的方式与路径，他在流动的空间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坐标、探索并重构身份的边界。

作为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美国的消费主义特性与复杂多元加重了达尔马托夫移民的身份困境，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漂泊与无根性。主人公在美国产生的身份危机主要有表层和底层两种，且都体现在他对街道、高楼等空间景观的直观感受上。第一层为典型的移民困境。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职业是在新环境立足的第一步，也是确立身份的基础。但是达尔马托夫的职业发展仍局限于移民圈或俄语世界内部，他工作的移民电台主要面向俄罗斯、使用俄语进行播报，而他视为主业的文学则无人问津。尽管电台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但是办公空间的高端与光鲜更加反衬出了主人公实际工作内容的贫瘠与荒诞。虽然主人公漂洋过海搬到了所谓多元、包容的美国，但是想象中的自由仍然没有到来，达尔马托夫从一个社会的异见者成为了另一个社会的外来者，只不过移民之后这种边缘性与他者性更加隐蔽并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空间的急速扩张、流动与个人精神空间的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居住与办公场所的中心位置与个体的边缘地位构成讽刺的反差。

主人公产生的第二层身份危机则直接与纽约这座现代化都市的空间特性有关，小说描述的纽约以其高耸入云的建筑、繁华的街道、复杂多样的人口而呈现出快节奏、流动性强的特点，而纽约的这些特质则让主人公更加缺乏安全感。作家多甫拉托夫在小说开头描写了许多商品化的形象，凸显了纽约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表征：“窗户对面是一个闪光招牌——殖民银行”（Довлатов, 2011b: 7）^①；“楼下是大厅、咖啡厅、烟草店和照相馆”（8）。这座城市在文化与种族上的多元性也反映在作家对地铁、办公楼等空间的塑造中，拥挤的地铁、吵闹的青少年、不同肤色的保安、路过的强盗……这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透露出纽约的混乱和不稳定。纽约社会的多元性和对“身份”的强调反而将主人公时刻暴露在主流地位集团的审视与拒绝之下。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现代社会物质、消费、机会的丰盈甚至过剩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却提高了人们的欲望阈值，失去“固定性、边界性和连续性”的物加剧了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鲍曼，2002：

130)，因而20年前被“战争、轰炸、撤离”包围的达尔马托夫“总是笑着醒来”，20年后生活安定的达尔马托夫一觉醒来却满脸“令人作呕的丑态”（7）。

达尔马托夫同众多移民一样面临着“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以及“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的身份困境（霍尔，2010：4），就像小说中移民电台节目主题“俄罗斯及其未来”一样，俄罗斯过去和现在已经清晰确凿，未来却仍是一团迷雾，主人公的身份也是如此，身份仍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经历已经定型，未来又将如何自居？相较于外显的焦虑，他将自己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怀疑和对过往的留恋隐藏在日常的忙碌之中，这更像是达尔马托夫的一种消极的回避，所以他声称自己“并不关心俄罗斯的未来”（17）。达尔马托夫这种刻意游离在任何群体之外的生活方式则是对自我的放逐与遗忘，这恰恰证明他遇到了主体性危机，对文学梦的坚持也意味着他尝试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寻找永恒之物。

然而一场由美国俄侨组织的“新俄罗斯”研讨会打破了达尔马托夫生活的平静表象，使得他隐匿的身份困境彻底浮出地表。大量俄侨聚集在一起，短暂地在异国他乡围筑了一块俄罗斯的精神飞地。在经历了与故土地理与文化空间的断裂之后，他们在俄侨大会上组成了“最为丰富的也是最能感知的‘他者’化身之间的联合阵线”，尝试“将各种各样的分散的充满恐惧和无所适从的个体，拼凑成一个模糊的使人联想到‘民族共同体’之类的东西”（鲍曼，2002：171）。身处这个脱离现实、仿佛位于真空的离散共同体空间之中，达尔马托夫对俄侨群体却并没有产生归属感，而是作为旁观者抽离出来，看到了隐藏在这一临时构建的小型共同体的团结叙事之中的不和谐，以及脱离单一意识形态之外各界侨民混乱的民主、自由的离散、焦虑的自证。这些侨民主动或被动移民到美国，却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离开了俄罗斯，精神上却仍保留着俄罗斯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与弥赛亚意识，他们坚信“俄罗斯是未来的国度，因为它的过去十分可怕，当下又迷雾重重”（138）。这场荒诞的政治游戏刚好切中了小说的标题“分支”，филиал一词在俄语中意为“大型企业、机构、组织的分部或独立部分”，小说中这个词作为俄侨大会的口号出现，激动的俄侨们提出要在美国建立俄罗斯的分支，而“侨民”则是“俄罗斯这个未来之国”的“当之无愧的分支”（138）。每位参会者都试图通过探讨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俄侨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来寻找移民群体新的身份定位，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俄罗斯与俄侨的未来，正是出于对明天的不安与恐慌，“普遍的身份认同感……只是一种体验和经历的伪造品”（鲍曼，2002：156），他们将远离母体的焦虑转化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面对大会上“荒谬、可疑”（29）的场景，在心理与外部的离散共同体空间之间强烈的不契合感之下，达尔马托夫隐匿的身份危机终于爆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空间的转换让他感觉到失去自我的定位与意义：“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到底

在等待些什么?”(39)“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从哪里来?我为了什么而在这里?”(30)从纽约到俄侨大会,主人公从感知到被边缘化与被他者化的日常空间进入了短暂回归主流群体的非日常空间,这种奇特的感受让他开始模糊现实与记忆,此时初恋女友塔夏的出现更是让他陷入了对祖国的回忆,给了主人公一个转向过去的契机。

记忆与现实:双重时空中的身份追寻

对俄罗斯的怀旧回忆为主人公的身份追寻之旅增加了时间的维度,过去的列宁格勒与现在的美国被塔夏和俄侨大会模糊了界限,交错的时空迫使主人公直面过往、思考当下,转向记忆与现实构成的双重时空之中寻求身份认同。小说《分支》的一大半都采用回忆和现实交替进行的叙事方式,叙事空间也在列宁格勒和俄侨大会之间穿梭,空间的交替和时间的非线性营造了强烈的超现实感,而塔夏便是连接两个时空的关键人物,一边是在列宁格勒与塔夏相遇相知到相爱的记忆,另一边是在美国举办的俄罗斯移民大会。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割裂的:“时间本身是荒诞的;空间本身也是这样。相对性和绝对性都是相互映射的结果,每一方都常常涉及另一方;空间和时间亦复如是”(迪尔,2003:86)。巴赫金(1998:274)的时空体概念也指向了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这个术语表示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在流动的时空中,达尔马托夫被拉回到青年时期在列宁格勒生活的记忆之中,被迫直面深藏在潜意识中的身份困境,回顾在列宁格勒的一砖一瓦如何将“我”拼凑成“我”,并将其与进行时的美国时空进行对比,发现“我”的变化或异化,思考未来“我”又该如何认识“我”。

祖国以记忆的形式重现,塔夏、主人公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记忆中的俄罗斯与当下所处的美国两个时空连接起来,达尔马托夫的视角在两个时空之间转变。主人公透过塔夏看到了被丢在身后的精神故土,也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正要前往的未来,怀旧的诱惑以及对现实的排斥激发了达尔马托夫的身份危机,从而驱使他转向记忆,诉诸记忆中的列宁格勒时空,这成为了他确立自己身份的一种尝试。身份认同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动态过程。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人的回忆能力视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思考行为能够回溯到过去的任何一种行为或思想,那么这个人的身份认同就能得以确立,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拥有同一个我,而这同一个我就是现在正在反思过往行为的那个我”。塔夏与主人公周围光鲜亮丽的环境格格不入,她与豪华酒店、宴会、酒吧等消费符号形成对比。“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经由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哈布瓦赫,2012:47),正是狼狈又无助的塔夏让主人公想起了破旧却温暖的列宁

格勒。打动达尔马托夫的并不是印在纪念品首饰盒上精致华美的列宁格勒，而恰恰是那些琐碎的、日常的、与个体经验直接连接的细节。主人公对待塔夏的感情也是如此。

主人公回望过去正是为了反思当下、看向未来，试图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寻找永恒之物，解答自己对身份与主体性的困惑。“对身份的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鲍曼，2002：126 - 127）达尔马托夫因为空间流变而感到置身于孤岛，与人的联结脆弱而岌岌可危，无法融入纽约，也无法享受荒诞的俄侨大会，变化与流动加深了不安全感，所以他借此机会回望无法再现却也因此成为永恒的列宁格勒。记忆并不等同于历史，记忆作为主观性的传说有不可靠、脱离真实的一面。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2012：145 - 146）认为，“从意识之前到有意识、从意义到语言和图像、再从图像和语言到文字”持续转码、翻译的回忆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改变、转移和延迟”。关于苏联的记忆与主人公当下所处的美国形成对比，经过修饰、想象与建构，成为他逃避失落的“今天”而试图寻找身份认同的“昨天”。达尔马托夫为列宁格勒以及塔夏增添了怀旧的滤镜。“怀旧——英语词汇 *nostalgia* 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 *algia*（怀想），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博伊姆，2010：2）怀旧的力量使得达尔马托夫视角中的列宁格勒充满温情，一切细微的事物都具有了审美性。并且小说中对列宁格勒城市空间的描写总是与达尔马托夫个人的经历直接相关，比如他曾坐过的电车和散过步的河岸。不同于纽约的异己和俄侨大会的悬浮，列宁格勒是主人公与世界连接的纽带。

达尔马托夫试图在列宁格勒寻找对身份的确信感和归属感，寻找自己在现实世界的坐标。怀旧的人所怀念的也许“并不真的是一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而是这种和世界的亲密感”（博伊姆，2010：279）。与达尔马托夫在美国体验到的身份恐慌与迷茫不同，列宁格勒时期的主人公虽然物质上一无所有，但是还未对自己的国族和文化身份产生怀疑和困惑，并非处在俄罗斯的“分支”，而就在本体之中。并且在20年前的列宁格勒，达尔马托夫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代，拥有“自由和青春”（42）。因此，与其说达尔马托夫怀念的是列宁格勒这座城市或塔夏这个人，不如说他怀念的是记忆中的自己和想象的故乡，以及“与世界的亲密感”。

记忆无法取代现实，过去的时空也无法代替正在进行的时空，但是在《分支》中，达尔马托夫不仅将列宁格勒与塔夏视为自己的青春和过去，而且发现，这个“过去”突然变成了他的“现在”，而且有可能也将成为他的“未来”，记忆构成了全部的他，现在与未来的每一天，主人公都将携带着记忆以及记忆中的俄罗斯而活着（141）。这与作家多甫拉托夫对自己国族身份的态度相同，虽然他曾在采访中称“从未感觉到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民族”（468），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不留恋祖

国，恰恰相反，俄罗斯是伴随他终生的经验与记忆。记忆也是多甫拉托夫小说的重要主题，尤其是移民之后的小说中，旧物、故人都会唤起主人公的回忆，这些记忆承载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对逝去岁月的怀念，记忆组成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而回忆这个行为本身便是他们进行身份认同与建构的过程。正如他在另一部移民时期创作的小说《手艺活》(Ремесло)中所写的那样：“祖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经历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祖国。而所有过往都将永远存在……”(Довлатов, 2011a: 195 - 196)“过往将永远存在”，让“我”成为“我”的一切都留在记忆中成为永恒，这便是达尔马托夫在俄侨大会与列宁格勒双重时空探寻的收获。

回归日常时空：文化夹缝中的移民身份重构

达尔马托夫无法永远停留在记忆中的故园，会议结束之后他终究要离开俄侨大会这个非日常空间，此时如何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未来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构建自我认同，成为摆在他面前的课题。达尔马托夫对塔夏和妻子这两个女性形象的态度转变反映了他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在二者及其分别代表的俄罗斯与美国文化之间抉择意味着他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设定边界，选择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他完成了作为俄裔美国移民的身份重构。

塔夏与达尔马托夫的妻子象征着俄罗斯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及前现代与现代两种精神。达尔马托夫的妻子理性、精明，是资本主义都市生活培养出的现代人的代表，按照她所持有的金钱为上的价值导向，主人公达尔马托夫只能算是“一个平庸又可悲的移民，自命不凡的失败者”(130)。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2010: 34)发现了这种金钱关系与货币经济影响下的现代心理特征，即追求客观、无特性、理性、逻辑以及推崇利己主义，因为“金钱抽象、客观的本质带来的非人格性和普遍有效性，一旦考虑其功能和运用，就会为利己主义和分化服务”。然而主人公显然并非一个“合格”的现代都市人，他仍然渴望着爱与陪伴，认为自己虽然按照世俗标准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爱妻子这件事上是“美国冠军”(131)。对待塔夏的态度彰显出主人公对非理性、反逻辑的隐性渴望，与光鲜亮丽、精明冷漠的现代都市人——自己的妻子——相比，塔夏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她是理性、克制与算计的反面，她“任性、荒唐、不讲道德，像孩子一样”(132)。塔夏就像达尔马托夫记忆中的列宁格勒一样，破旧而并不精美，然而他却能从中找到纽约与洛杉矶、妻子与其他“成功”的侨民身上所缺失的东西，可以将其归为对前现代的迷恋，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抗，也可以归为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唤醒，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排斥。塔夏及其代表的的生活方式让主人公看到了“被现代性社会不断裹挟而逐渐变形的身躯重新直立起来”(胡晓静, 2024: 81)的可能性。所以小说中达尔马托夫承认他依然爱着塔夏，并且“一

直到所谓的坟墓”(154)。塔夏这个形象的含义已经超出了某个具体的人本身，而是附加了主人公的记忆、幻想和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爱的是被建构的形象。

多甫拉托夫俄侨小说的大部分主人公在美国都市中所处的生活状态都呈现出强烈的“异化”感，他在描写纽约这座作家和他笔下移民主人公生活的城市时，特意凸显了其商业化，路边店铺、摊贩、商店招牌、橱窗模特、购物中心高度密集，成为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的符号化象征，加剧了人的异化。那么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生活本真，实现人的自由与“充分”？作家多甫拉托夫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原则，仅书写人们怎样生活而不指明应当如何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小说主人公的选择与命运中窥见一些作家本人的价值判断。多甫拉托夫并不赞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风气，也会揭露“自由”与“民主”的消极面，这是重视“精神性”(духовность)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体现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人”身上，就转化为俄罗斯移民文化身份的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分支》中的达尔马托夫选择回归纽约的日常生活，《外国女人》(Иностранка)中的玛露夏被拉丁裔青年拉斐尔的日常温情所打动，他们找回主体性、重构身份的过程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多甫拉托夫回归日常生活的主张，并且这种日常生活并非美国式的、现代化的生活，而恰恰是俄罗斯式的、反现代性的生活，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建立精神与情感联结而非彼此推开的生活。

通过回忆，达尔马托夫重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可贵，虽然他将永远保留着列宁格勒的回忆，但是他现在以及未来所能够拥有的亲情、友情等其他形式的关系都只能在美国建立与维系。家里打来的电话将他从回忆与现实交融的俄侨大会以及列宁格勒双重时空中拉回来，提醒着他美国不仅仅只有陌生、疏离的现代性生活之碎片，还有实实在在的扎根于日常生活的亲情与爱。俄罗斯学者克拉夫季娅·多切娃(Клавдия Дочева)(2004: 106)提出：“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家庭、重构并反映代际联系……是多甫拉托夫笔下自省的‘我’与周围荒诞扭曲的世界抗争的方式。”俄侨大会之行，让小说主人公从倍感无聊、整日期盼意外发生转变为对意外感到疲倦，空间的变迁使他珍视自己与世界的情感连接。所以才会有他对家人的惦念、对妻子的告白，而对话也仿佛是对孩子存在本身的反复确认：家中的电话号码“蕴含着某种魔力。它们一千次将我从荒诞的国度拉回到现实生活的边缘”(152)。同样，在纽约建立的友情也是将他拉回现实的纽带：“最好的还是纽约和它那毫不掩饰的粗野。至少那里在街上遇到朋友，可以惊呼：‘好久不见!’”“在洛杉矶，朋友之间能偶遇的地方只有高速公路。”(151)在列宁格勒、俄侨大会和美国日常生活的时空对比中，他发现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同样都是荒诞

的,无论身处哪个时空,生活都没有本质不同。美国斯拉夫文学研究者马克·利波维茨基(Марк Липовецкий)(1999: 274)认为,“多甫拉托夫的荒诞蕴含着特殊的‘隐匿的温情’,它揭示(或印证)了人类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小说《分支》的结尾主人公接受了现实生活的荒诞,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他仍然在积极地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人与时间及空间、人与世界之间所建立的情感联系。

达尔马托夫想要寻找的从来不是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标签,而是在流动性、不确定性都越来越强的当代社会中残存的某种永恒性与确定性,即在荒诞现实中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物质社会中探寻永恒的文化精神,准确地说,是俄罗斯传统的文化精神。经历了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俄侨大会、过去的列宁格勒等不同时空之中的身份认同之旅,主人公将祖国的过往永远留在记忆中,俄罗斯语言、文学、文化是他的根基,同时列宁格勒成为他回不去的精神故园。无论是小说中还是小说外,主人公达尔马托夫与作家多甫拉托夫都坚持以文学为使命,并始终坚持用俄语写作,这成为了他们对抗痛苦与身份焦虑的最终武器。身份认同“不是所谓的寻根,而是与我们的‘历程’达成妥协”(霍尔,2010: 5),最终主人公实现了与自己 and 过往的和解,接受了生活的荒诞性和同质性,接受了自己身份的复杂性。尽管达尔马托夫——或者说藏在主人公面具之下的作家多甫拉托夫——总是在幽默与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之中流露出一种漠然情绪,但是他并没有停下寻找人生意义与自我定位的脚步。多甫拉托夫过着颠沛流离、有着强烈不确定性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永恒之物,也没有放弃追求人生的最终意义与目标,而是继承了俄罗斯文学注重精神追求的传统,这使得他在同时代一众后现代主义作家中脱颖而出。正如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薇拉·柴可夫斯卡娅(Вера Чайковская)(1993: 6-8)指出的那样,多甫拉托夫作品中呈现的是“延续俄罗斯精神漂泊传统的自画像式人物”,以及“被命运放逐到‘彼岸’的漂泊者主人公的精神探寻”。即使这些主人公通常以悲剧结尾,但多甫拉托夫拒绝停滞在过去无论美好还是痛苦的回忆中,总是让笔下的主人公看向“未来”,在“过去”与“未来”中总是选择未来,因为生活总是要继续,尽管人们只是“将一种悲伤换成了另一种悲伤,仅此而已”(Довлатов, 2011a: 115)。

结 语

在小说《分支》中,作者多甫拉托夫聚焦于俄罗斯移民达尔马托夫在美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从空间与时间维度展现了主人公达尔马托夫在不同时空中所经历的身份焦虑、探寻与重构。达尔马托夫的身份困境本质上源于俄罗斯与美国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他的身份问题不仅关乎“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会成为谁”,

还在于如何在流动性的时空与荒诞的日常中找到永恒的精神追求与“我”的存在意义。亲情、友情或者其他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情感联结成为达尔马托夫确认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也成为他用来抵抗荒诞与无意义的武器。达尔马托夫将文学或者说俄语文学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其背后的俄罗斯文化传统成为他精神中永不褪色的底色。主人公接受了现实的荒诞与生活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却拒绝被环境同化，而是回到日常之中坚持自己的追寻，将个人作为俄罗斯传统精神的分支，在地球的另一端与时代的洪流进行悲剧性的对抗。至此，在重新发现珍视与信仰之物的过程中，他实现了自我的重生，完成了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身份”建构。

注释：

- ① 凡引自多甫拉托夫《分支》中的内容，均出自：Довлатов С. Д. 2011b.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х т. (Том IV) [M]. Арьев А (сост.). СПб.: Азбука. 引用时只出现页码，不另做注。

参考文献：

- 阿莱达·阿斯曼. 2012. 回忆的真实性[C]//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余传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42-155.
- 巴赫金. 1998. 巴赫金全集(第3卷:小说理论)[M]. 钱中文,主编.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鲍曼. 2002.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段义孚. 2018. 恋地情结[M]. 志丞,刘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亨利·列斐伏尔. 2003. 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C]// 包亚明,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7-58.
- 胡晓静. 2024. 论《手工艺》的爵士乐书写与多甫拉托夫的文学“手工艺”观[J]. 当代外国文学, 45(2):75-82.
- 迈克·迪尔. 2003. 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C]// 包亚明,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83-110.
-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12.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C]//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余传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7-66.
- 斯图亚特·霍尔. 2010. 导言:是谁需要身份?[C]// 斯图亚特·霍尔,编.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21.
-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2010. 怀旧的未來[M]. 杨德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西美尔. 2010.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刘小枫,选编. 顾仁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建华. 2003. 荒诞的存在与本真的叙事——多甫拉托夫的后现代主义短篇小说述评[J]. 外国文学(6):18-23.

- Генис А. А. 1995. На уровне простоты[С]// Арьев А. Ю (сост.).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й Довлатов. СПб.: АОЗТ «Журнал “Звезда”»: 46 – 473.
- Довлатов С. Д. 2011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х т. (Том III)[М]. Арьев А (сост.). СПб.: Азбука.
- Довлатов С. Д. 2011б.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х т. (Том IV)[М]. Арьев А (сост.). СПб.: Азбука.
- Дочева К. Г. 2004.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личности геро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Сергея Довлатова[Д].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с. наук. Орел: Ку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1999. И разбитое зеркало[С]// Арьев А. Ю (сост.). Сергей Довлато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ичность, судьба. Итоги Пер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овла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журнала «Звезда»: 266 – 276.
- Чайковская В. И. 1993. «Линии судьб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зе[Д].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4): 3 – 26.

Space, Memory and Everyday Life: Immigrant Identity in Sergei Dovlatov's *The Affiliate*

LI Zhenhua

Abstract: *The Affiliate*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works by Sergei Dovlatov, a contemporary Russian émigré writer, created after his immigration. The novel portrays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Russian émigré Dalmatov under the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and Russian cultures, and narrates his journey from encountering an identity crisis to reconstructing his ident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fluidity and interweaving of time and space as 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protagonis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change of space after immigration highlights the protagonist's identity crisis, while the Russian émigré symposium triggers his hidden identity anxiety. The time-space interweaving of the symposium and Leningrad, blurs the boundary between memory and reality, leading him to seek identity in the past. Ultimately, by choosing to return to everyday life, the protagonist redefines his sense of identity. He accepts the absurdity of reality without compromising, continuing to seek eternal spiritual solace amidst uncertainty, while maintaining the plurality of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an “identity” that transcends any other kind of identity.

Key words: Sergei Dovlatov; *The Affiliate*; time-space; identity; memory

(责任编辑:曹亮)